

凡大年初一，还窝在病房里的患者，一般都身染大病。我便是其中之一。41年前，我在龙华医院度过一个惊恐的春节。

那个除夕之夜，“雪纷纷，掩重门”，孤寒难忍。一间8张床的病房，7位病友回家过年，唯有我独守冰冷的空房。

何尝不想回家？回不去啊！不幸被诊断为“不死的癌症”强直性脊柱炎，不止是寸步难行，就是卧床也是“痛不欲生”。医嘱为家族遗传，不治之症。

想到此，不禁一阵惊恐：我还会有明天吗？

年初一的早晨，无情的风雪“歇脚”了。“雪晴天地一冰壶。”面对四周苍白的墙，心中浮现一阵落寞与惆怅……

“8床，有人来看你了！”一位护士在病房门口招呼。

啊，是她，寄明大姐，怎么会是她。

她紧握我的手：“小朱，新年好！”

“大姐，新年好！”我喜出望外，孤寒的心顿时一热。

她听出版社一位朋友说起我在生病。前两天，她去了我家，才知道我在龙华医院。

她从包里拿出一袋饼干与两听麦乳精，说：“午睡以后，冲一杯喝喝。”话语就慈慈母般亲切的叮咛。

她坐在我床边，轻声讲起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与吴运铎的故事，鼓励我即使将来遭遇不测，也可以有所作为。临别时，她肯定地说：“国家在发展，医学在进步，今天的一些疑难杂症，以后一定可以攻克。”一番和风细雨，温暖了悲凉的病房，我惊恐的心渐渐舒解。

第一次见到她，是在出版社组织的一次音乐创作座谈会上。主持人汪玲

民谚“世上没有后悔药”，如果用绍兴话表述更为形象：“好吃时完了，晓得时搞了。”搞，晚的意思。

父亲在世时经常用此话来教育子女，我们也一直引以为真理。但一只钢精锅子的故事，对此话有了新解。

小儿子买了只钢精锅子。但不知何故，锅子分量重，并且传热慢。锅自然不太讨人喜欢，偶然用一下。

有一次，水烧干，以致整个锅通红，估计锅会坏，但冷却后发现锅底分离出一只薄薄的底。再继续用，又发生了几次“烧红”事故，锅底居然又分离出一只厚厚的底：足有六七毫米。

此时，我才恍然大悟：原来这是一只有三层底的钢精锅！它传热虽慢，保温性却不错。现在倒好了，它既可做普通锅用，也可做砂锅用。不过，我却多用作煮自创“八宝粥”的专用锅。

父亲的“好吃时完了，晓得时搞了”新解为“好吃时完了，晓得时没搞（完）”，又让我们明白了新的生活道理。感恩父亲！



把我领到她的座前：“这是上海港的词作者小朱。”继而对我说：“这是上影厂的寄明。”

哦，寄明，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：“大姐好。”我说。她立即起身，跟我握手。那天，她身着深藏青两用衫，脚上一双布鞋，一头齐耳短发，眼镜的镜片上密纹一圈圈。

“小朱，你好，以后可以为我们电影插曲写词吗？”

“好的，好的，可是，我以前没写过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看过你的作品，可以写。”

没想到半个月之后，接到她的电话，约我到她家里谈创作。我受宠若惊：寄明是位大作曲家，《李时珍》《春满人间》《燕归来》《金沙江畔》等二十几部影片都回响她的旋律。其中《英雄小八路》插曲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》，传唱、培育了几代中华儿女，后来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；而我只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业余作者，两者有天渊之别。受她如此抬举，我既兴奋又不安。

那天下午，如约走进复兴西路34号寄明的居所。她递给我一本标题为《朝霞异彩》的电影分镜头剧本，并翻到导演安排配歌的一组画面，细说镜头的组接方式与时长，还提示这样的时长对歌词篇幅的要求。我就像个小学生虔诚聆听大师“解惑”。

一个星期之后，她摸到我家里来了——豫园附近一个三层阁上，送来了《英雄小八路》等三个电影分镜头剧本及插曲的歌词，为我提供创作的范本。她告诉我，马上要随摄制组去邯郸体验生活，写好的歌词直接寄到河北。

后来我就“邯郸学步”，通过多次信件来往，

我就收到了P哥哥我的一张封片戳，里面夹着一页9枚“雪龙2”号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的深蓝印戳。

群友有收藏封片戳的，也有收集邮票的，更多的是二者兼而有之。一次在湖南长沙岳麓山路上，几位群友走进一家邮局，请邮局工作人员拿出戳章盖戳。其中一位老先生的一本小簿子，一页页盖着不同戳印。他说，每到一地就要寻邮局盖戳，不然就觉得遗憾。另一次群友们前往神农架途中，在王昭君故里吃了午饭，一位长

我就收到了P哥哥我的一张封片戳，里面夹着一页9枚“雪龙2”号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的深蓝印戳。

群友有收藏封片戳的，也有收集邮票的，更多的是二者兼而有之。一次在湖南长沙岳麓山路上，几位群友走进一家邮局，请邮局工作人员拿出戳章盖戳。其中一位老先生的一本小簿子，一页页盖着不同戳印。他说，每到一地就要寻邮局盖戳，不然就觉得遗憾。另一次群友们前往神农架途中，在王昭君故里吃了午饭，一位长

我就收到了P哥哥我的一张封片戳，里面夹着一页9枚“雪龙2”号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的深蓝印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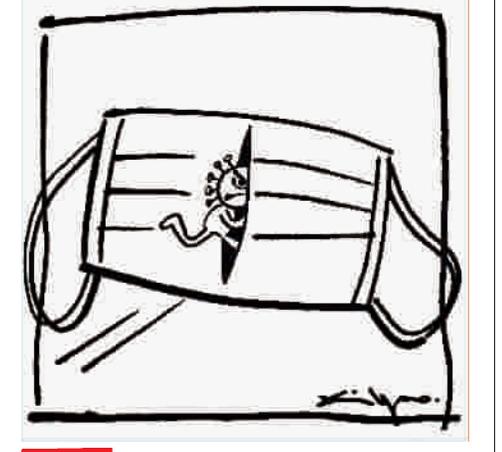
群友有收藏封片戳的，也有收集邮票的，更多的是二者兼而有之。一次在湖南长沙岳麓山路上，几位群友走进一家邮局，请邮局工作人员拿出戳章盖戳。其中一位老先生的一本小簿子，一页页盖着不同戳印。他说，每到一地就要寻邮局盖戳，不然就觉得遗憾。另一次群友们前往神农架途中，在王昭君故里吃了午饭，一位长

我就收到了P哥哥我的一张封片戳，里面夹着一页9枚“雪龙2”号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的深蓝印戳。

群友有收藏封片戳的，也有收集邮票的，更多的是二者兼而有之。一次在湖南长沙岳麓山路上，几位群友走进一家邮局，请邮局工作人员拿出戳章盖戳。其中一位老先生的一本小簿子，一页页盖着不同戳印。他说，每到一地就要寻邮局盖戳，不然就觉得遗憾。另一次群友们前往神农架途中，在王昭君故里吃了午饭，一位长

我就收到了P哥哥我的一张封片戳，里面夹着一页9枚“雪龙2”号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的深蓝印戳。

群友有收藏封片戳的，也有收集邮票的，更多的是二者兼而有之。一次在湖南长沙岳麓山路上，几位群友走进一家邮局，请邮局工作人员拿出戳章盖戳。其中一位老先生的一本小簿子，一页页盖着不同戳印。他说，每到一地就要寻邮局盖戳，不然就觉得遗憾。另一次群友们前往神农架途中，在王昭君故里吃了午饭，一位长



智慧快餐 郑辛遥 防病毒、防传染，还须防假冒！

按她意见反复修改。就在这样的“函授”过程中，我逐步熟悉了电影插曲创作的“套路”。

拜她吉言所赐，我的“不治之症”终被当代医学控制，没有恶化到瘫痪。可是，她自己后来却被病魔残酷地剥夺了明天。

寄明从邯郸体验生活回来后，介绍我加入“聂耳星海学会”，与音乐界前辈一起，感受两位人民音乐家在民族解放的焦土上爆发火花的灵魂，体会艺术应该担负的使命。

有一次，学会组织讨论张克仁先生为聂耳创作的半身雕塑像。在会前签到的时候，寄明手握签到笔，好像在想什么，迟疑了四五分钟。我在她身后轻轻催促：“大姐，签个名吧。”她才慢慢地签在单上写了“寄”字的上半部：

一个宝盖头与一个“大”字；下半部的“可”，好像一时想不起来，就把一个“明”字填上去，上下拼出了一个陌生的别字。谁会知道，这是她失智的开始。3年以后，1987年，她变成了毫无感知的“植物人”。受尽8年折磨之后，她把明天交给了我们，自己远去了……

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又是一个年初一的早晨，又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早晨，我不得不再想起了这位恩师、敬爱的寄明大姐。

庚子年似乎总是不安生。电台传来紧张的疫情报道。电视上出现除夕夜大批医务人员驰援武汉的矫健身影。他们也是骨肉之躯，他们也有儿女情长，为了人类的健康，他们舍弃了常人眷恋的天伦之乐与个人安危。我想，我们赞

美他们，呵护他们，绝非仅仅在抗疫的危情时刻。

睿智的艺术人生，是以祖国的明天为理想；而我们医务工作者的努力，不也是为人们赢得更多的明天吗？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们跟寄明大姐一样，都是那样崇高，值得我永远敬重。

发或者躺在床上，不到洗澡、睡觉不换衣服；另一类是部分区分，即回家后先穿着外面的衣服在椅子、沙发或床上坐一会儿，然后再换居家服。不论是哪一类做法，其实都不耽误“把外面的病毒带回家”。

再来看看“行”。很多年轻女性喜欢留一头浓密长发，不论直发抑或卷发，一律成瀑布状垂于脑后，时而用手盘整，时而以头后摆，大有迷倒众生之势。但大部分女性在洗完头时，基本不会在回家后对

“擦遍”公共场所的长发进行消毒。

此外，不论男女老幼，绝大部分市民似乎并没有养成每天对手机，进而对自己的耳部进行消毒的习惯。而在公共场所戴口罩一般都会关切地询问：“你是不是感冒了？”也就是说，在大部分市民的潜意识里，除非自己得病，出入公共场合及人员密集场合是没有必要戴口罩的。至于公共场合打喷嚏、咳嗽不捂嘴也是普遍现象。

这次疫情，无疑是促使大家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良好契机。

边看边聊

上海话不是本地话。本地话是浦东话。

上海开埠后，各地人来上海讨生活，其中苏州人、无锡人、宁波人、绍兴人、广东人、福建人、苏北人、安徽人、山东人较多。当年的上海滩之杂，相当于纽约的法拉盛——美国最大的中国城，听不懂的不是外国话，而是外地话。大家挤在一个屋檐下，经过长期磨合，为了生意、生存、

生活，杂交出上海话。这是各地方言妥协后得出的最大公约数：苏州话与宁波话权重最大，以此为基调形成了上海话。上海话“嗲”是苏州话“嗲妹妹”的变迁；同样意思的“赞”，胚胎是扬州方言：“《水浒》就是一把赞壶”；“哪能？”（咋啦）是苏州人挑畔语，“哪亨”的变异。阿大阿二（读ni），那是从“宁波阿娘”的语系演变过来的。

1999年我在瑞金二路电话亭里回复拷机上的来电，听到电话间老阿姨在闲谈：“7号里（198弄）又吵得不可开交，都想卖房搬出去。”倘若如此，就是一整栋新式里弄出售，我立即上门动迁。上下四户人家立在底楼谢家，一致对外地盘问我：“李先生屋里哪间？”上只角人的地域观非常强烈，即便谈论浑身不搭界的话题，也要抖出来豁豁，上海话：卖样洋样！（显摆显摆）我干脆利索：“大杨浦滴！”其中一位中年妇女马上两手抱胸，居高临下地告诫：“迪只地段李先生是看得懂格。”眼角瞟依，言外之意：曾经高档地法租界，准备坐地起价。我客客气气地夸道：“灵光地段！”话锋一转：“不

美他们，呵护他们，绝非仅仅在抗疫的危情时刻。

睿智的艺术人生，是以祖国的明天为理想；而我们医务工作者的努力，不也是为人们赢得更多的明天吗？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们跟寄明大姐一样，都是那样崇高，值得我永远敬重。

发或者躺在床上，不到洗澡、睡觉不换衣服；另一类是部分区分，即回家后先穿着外面的衣服在椅子、沙发或床上坐一会儿，然后再换居家服。不论是哪一类做法，其实都不耽误“把外面的病毒带回家”。

再来看看“行”。很多年轻女性喜欢留一头浓密长发，不论直发抑或卷发，一律成瀑布状垂于脑后，时而用手盘整，时而以头后摆，大有迷倒众生之势。但大部分女性在洗完头时，基本不会在回家后对

“擦遍”公共场所的长发进行消毒。

此外，不论男女老幼，绝大部分市民似乎并没有养成每天对手机，进而对自己的耳部进行消毒的习惯。而在公共场所戴口罩一般都会关切地询问：“你是不是感冒了？”也就是说，在大部分市民的潜意识里，除非自己得病，出入公共场合及人员密集场合是没有必要戴口罩的。至于公共场合打喷嚏、咳嗽不捂嘴也是普遍现象。

这次疫情，无疑是促使大家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良好契机。

过，四家人家挤在一窝就不灵光了，早上上厕所的辰光，人的生物钟都是一样格，迪个辰光，女的坐在里厢马桶上，男的提着裤子立在门外头，还要排队起蓬头，像拎只钢种锅子买生煎馒头。”最后“既不方便，也不雅观”一句尚未出口，他们异口同声制止：“好了好了，要买就买，勿要讲得介肮三好哦！”肮三，英语 on sale（贱卖）的谐音，上海话里夹带外国闲话的元素，俗称洋泾浜闲话。

这些年上海话在变。年轻一代说“我”，基本都是圆口型，北方语系对上海冲击太严重了。上海人的口头禅“硬碰硬”，现在成了“昂碰昂”——那是苏北口音的上海话，就像小时候哑子卖刀，蹲在路旁，刀砍钢丝，一刀一断，心急得憋不住，高呼：“昂碰昂！”千年铁树开了花。

现在要了解上海人家的背景，只要听听孩子的口语，基本可以判断家庭经济背景：一口地道上海话的，那么外婆带大的，外婆肯定是个杨白劳。如果上海话很生硬，夹着外地口音的，那么是常年请钟点工的家庭。如果是外地口音，但听不出地域，那么是钟点工，钟点工流动性大，自然小孩的方言也混了。如果猜得出地域，那么是有住家保姆的。如果一口标准方言，说明保姆忠诚度，家长也厚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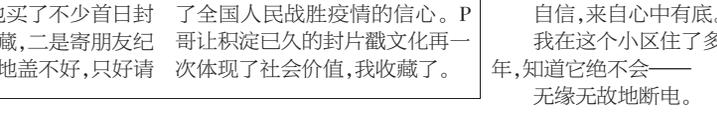
现在我的孩子是上海户口，还是上海籍，老子也是土生土长在内环的上海人，女儿却是个“昂碰昂”的上海人——会说一口英语，但不会说地道上海话。真正急煞老百姓！

意大利医生加尔瓦尼在实验中用解剖刀接触蛙腿标本时，发现蛙腿肌肉会出现收缩现象，对此他解释说，因为外面在打雷。又有一次，他看见挂蛙腿的铜钩只要和铁器接触，蛙腿同样会收缩，于是他认为：在不打雷的时候，蛙腿之所以收缩，是因为两种不同的金属相接触，加尔瓦尼因此作出一种假设：蛙的脑中有一种“电液”（或叫“动物电”），人身上同样也有“电液”。由于蛙腿肌肉是附着神经的，电液通过神经传到肌肉，致使肌肉收缩。

加尔瓦尼的假设被很多人接受，但是，意大利物理学家伏打在利用不同金属堆积而发明伏打电池的同时，对加尔瓦尼的假设表示了怀疑。作为回击，胸有成竹的加尔瓦尼将神经的断处与肌肉表面接触，蛙腿果然也收缩了。这次他下结论说，神经是有电的，肌肉收缩是通过电信号传递神经的。

那么，动物和人身上的电流是哪里来的？科学家们认为，不仅是脑细胞带电（产生电压），而且是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都产生电。而这种电能取自于身体本身的新陈代谢，并跟电池一样分为正电和负电，带上负电和正电的微粒被分开，从负极流向正极，建立起一种电流。

于是，每一个细胞都具备了基本电能。不过，人体电流是很微弱的电，通常只有50毫瓦的功率，但若把各个部位的总功率加起来就相当可观了。按说，每个细胞有着同样的结构，所以每个细胞能带来同样的功能，然而人体在不同的部位需要不同的功能，因此细胞被相应地“专门化”。就像电脑的操作系统一样，身体中的电能确保了人体的基本需要，借助操作系统的帮助，就能调用各种专门的程序，并使整个人体运转起来。倘若人体没有“自产电流”，机体就无法存在。当然，机体的存在和运转跟神经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是分不开的，神经活动会分泌一种被称为“神经递质”的化学物质，能对其他细胞发生作用，这是另一个话题了。



“昂碰昂”

李大伟



五颜六色

陈钰鹏

人体电流哪里来

陈钰鹏

底气

蔡旭

这个新春，不得不宅在家里。只能趁着夜深，小区道路上安静无人，才带着影子，到楼下散步。

一盏盏路灯迎面走来。影子一会儿走到前面，一会儿走到后面。

没有影子才是可怕的。即使我胆小如今年的生肖，我的脚步却淡定地解说闲庭信步。自信，来自心中有底。我在这个小区住了多年，知道它绝不会——无缘无故地断电。